

《北华捷报》记载的清末鼠疫

庄新



一九一一年，位于哈尔滨家甸的防疫临时消毒站入口。

1910年10月至1911年4月，东北暴发了历史罕见的鼠疫疫情，这场疫情致6万余人死亡，可谓近代一大浩劫。作为近代中国出版时间最长、最具影响力的英文报纸之一，《北华捷报》虽在上海出版，但在东北疫情初始便有所关注，随着疫情的蔓延、管控，对东北疫情展开了大量报道，包括很多鼠疫专题的新闻，从在华外媒的视角留下了大量珍贵的疫情治理史料。

疫情初期的关注

《北华捷报》迅速捕捉到东北鼠疫发生、蔓延的消息。1910年10月25日，满洲里首发鼠疫。11月9日，鼠疫由中东铁路经满洲里传入哈尔滨，一场大瘟疫席卷整个东北，波及京津、河北、山东等地。11月11日，《北华捷报》刊登了10月31日发自哈尔滨的电报，电报内容取自《大阪朝日新闻》，报道在中东铁路上的满洲里火车站，爆发了31例鼠疫，15例死亡。12月23日，《北华捷报》刊登11月26日发来的电报，介绍鼠疫已经蔓延到哈尔滨；已报告13起病例，所有病例均已死亡。1911年1月20日，该报又刊登《满洲的瘟疫》一文，是于1月11日发自奉天（今沈阳）的新闻，该文开篇便提到：“一种可怕的疾病——××鼠疫正在吉林省肆虐，甚至沿着这条路传播，而据报道，它正在从哈尔滨向东的中东铁路沿线肆虐。”

《北华捷报》也报道了东北鼠疫的危害。首先是造成巨大人员伤亡、社会荒凉。1911年1月27日，《北华捷报》刊登《鼠疫》一文，该文于1月14日发自长春：奉天电报报道，在满洲、宽城子（今长春）、奉天等地，死于鼠疫的人数每天都在增加，尸体随处可见。绅士和富人的大量外流使这些地方处于一种荒凉的状态。其次是经济严重受损。2月17日，《北华捷报》刊登《首都：鼠疫》一文，介绍了路透社的相关新闻，报道东北向欧洲的豆类贸易正在陷入瘫痪，这种情况对满洲的农民来说将是灾难性的。

对政府抗疫的报道

《北华捷报》对鼠疫发生后中国政府的反应有着密集的关注。《北华捷报》报道了中国组建防疫机构、制定相关章程的防疫情况。1911年，清政府设立了民政部防疫局、京师卫生警察队和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等，还命外务部、民政部、邮传部筹办防疫事宜。2月17日，《北华捷报》刊登《首都：鼠疫》一文，报道民政部已经招募了大量警察加入了卫生部门，该部门负责清理城市中较脏的区域，并收集疫情信息。在中央政府的防疫指挥下，东北及其他省份的地方政府也积极配合防疫。在东北三省总督锡良的督导下，1911年间，奉天防疫总局、吉林全省防疫总局等相继成立。3月10日，《北华捷报》刊登《鼠疫：吉林》一文，其中有2月20日发自吉林的消息，报道称在防疫局的积极和组织良好的努力下，当地的鼠疫得到了极好的控制。《北华捷报》也关注了政府的具体应对举措，如强化疫情报告、检疫隔离

制度等。在隔离检疫方面，1910年12月23日，《北华捷报》在《鼠疫》一文中介绍，吉林省长已下令在宽城子、哈尔滨至吉林的主要道路上设立检疫站。1911年1月27日，《北华捷报》刊登《鼠疫》一文，其中有1月13日发自奉天的消息，称该市已被划分为多个区，设有医院，同时也在为患者建立隔离医院。各级政府也采取阻断交通的方式，开展防疫工作。

该文还提到：日本和中国取消了满洲南部的二等和三等客运。在山海关设立了一个隔离站，头等舱旅客将在那里隔离五天。在这段时间结束时，如果他们表现出可疑的体温上升情况，他们将允许继续进行。

《北华捷报》也转载了其他报刊的相关新闻。1911年2月10日转载《京津泰晤士报》的新闻，介绍哈尔滨防疫家甸的防疫隔离举措，包括有四家鼠疫医院、三家疑似医院和检疫站，可容纳2000人。工人中有600名士兵、680名警察、500名从事殡葬、卫生和消毒工作的苦力，以及40名医生和助手。《北华捷报》认为，这至少证明，中国当局正在做出勇敢的努力，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应对这种局面。

在意识到传统医学无法应对鼠疫疫情之后，清政府采取西式防疫方式，启用留英医学博士伍连德统领防疫工作，推进外国医生援助东北防疫，并于1911年4月在奉天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万国鼠疫研究大会。1911年1月27日，《北华捷报》刊登《鼠疫》一文，其中1月15日发自北京的消息中提到，北京和天津的外国医生可能会组成卫生委员会，尽可能与中国人合作。1月13日发自奉天的消息，报道政府已邀请英籍医学传教士司督担任首席医疗顾问。4月22日，《北华捷报》刊登《国际鼠疫会议》一文。文章全文转载了大会主席伍连德医生在万国鼠疫研究大会上的致辞。致辞内容主要包括：概述疫情、疾病的起源、疫情的蔓延、会议议程等几部分。文章还介绍了“总督的接待”，以及“第一次医学会议”“细菌学和病理学”“通过动物感染”“关于鼠疫杆菌的讨论”等会议相关内容。

对防疫困难和限制的报道

《北华捷报》也注意到清政府疫情治理遇到的困难和限制。首先是经费筹集困难。东北鼠疫防控耗费巨大，使本已步履维艰的大清财政雪上加霜。1910年底，锡良曾两次向清政府请求拨款，清政府拨款31.2万两。1911年2月5日，锡良再次请求东北地方当局向大清、交通两银行“各息借银三十万两”。当月10日，《北华捷报》刊登《鼠疫》专栏，开篇便提及锡良要求财政部和邮传部授权大清银行和交通银行预付银30万两白银一事。1911年2月24日，《北华捷报》刊登《鼠疫》专栏文章，提到尽心尽力的中国官员不敢采取严格的措施，他们没有资金，也没有大量训练有素的人。

其次，疫情防控人员紧缺。1911年2月17日《北华捷报》刊登的《首都：鼠疫》指出，因缺乏训练有素的人，政府难以有效执行计划。几个医生、几个医科学生、一些警察、几百个苦力，远不能满足超过20万人口的城市防疫工作。而这一直是整个系统的弱点，政府不得不采用部分受过训练和未受过训练的人。

再次，民众的迷信无知和一些风俗习惯也阻碍防疫工作的开展。出于无知、恐惧心理，民众存在制造谣言、藏匿尸体的行为。3月17日，《北华捷报》的《鼠疫》专栏中举例，人们将尸体藏在城中大量积雪中，并安排运输局（雇工农场）的车夫把尸体连同积雪一起带走，然后把尸体埋在城外，这已造成当事人多名家庭成员死于鼠疫感染的情况，极大影响了检疫人员的防疫努力。在清朝伦理传统下，民众多采取土葬，难以接受火葬。但东北冬季冻土深厚，难以挖坟，大量暴露在外的尸体给疫情防控造成巨大影响。

对社会抗疫的报道

面对凶猛的鼠疫疫情，除了政府积极采取措施，大量的个人、群体等也以不同方式参与到疫情防控事务中。《北华捷报》也对此展开了报道。

医生、医务工作可以说是疫情防控中最重要的群体。《北华捷报》对中外医生应对疫情的举措都有所涉及。

除了中国医生的诊疗事务，传统药剂也为《北华捷报》所注意。1910年11月18日，《北华捷报》刊登了《中国鼠疫药方》一文，提及中国应对鼠疫的药方是服用将蛇皮、蜂巢和人头发烧后碾磨得到的粉末。在西医群体的防疫选择上，《北华捷报》注意报道西医开展鼠疫疫苗接种实验的情况。1911年3月3日，《北华捷报》在一篇报道奉天疫情的文章中，介绍了在东北抗击疫情的医生对于哈夫金疫苗效果的持续性实验情况，即医生自己注射疫苗，并详细观测10日内的反应，认为哈夫金疫苗的功效似乎已经确立，但从第5天到第7天，包括接种后，似乎有负面影响，人们必须非常小心。3月10日的《北华捷报》报道，政府愿意以最快的速度提供大量的哈夫金疫苗，但问题是让穷人相信并接受疫苗接种。

《北华捷报》也报道了东北地方商会的防疫事务。在疫情当地的社会社团中，商会对疫情的参与尤其代表性，设立了他们筹办的、防疫限制较西式防疫制度较为宽松的隔离医院。1911年3月10日，《北华捷报》刊登文章《鼠疫：吉林》一文，其中2月21日发自奉天的消息指出，商人阶层的问题非常严重，他们坚持在自己的控制下为自己的阶层提供特殊的隔离成分。不幸的是，他们的装备远不如政府安置得那么好，而且死亡率非常高。2月27日发自奉天的新闻，报道了那里的商人收取捐款，开办了一家独立的鼠疫医院。但他们坚决反对一切现代方法，特别是消毒剂。几天之内，两个最著名的“医生”都去世了。3月24日刊行的《北华捷报》也表示，奉天这个城市，要不是商会的目光短浅，现在可能已经清除疫情了。

总的来说，英文报纸《北华捷报》从外媒的视角观察记录、评论了1910年至1911年间鼠疫疫情的详细情况，报道了清政府及社会应对鼠疫的方式，对在华的外国人了解此次疫情提供了最直接的报道，而且该报对中国各方面抗击这场鼠疫给出了较高的评价。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傅雷与钱锺书的一次别扭

杨建民



钱锺书与傅雷的熟知，应该是在抗战后期的上海。当时有良好的学人们不知何时“天光”，日子难过。钱锺书夫妇及其他友人，常去傅雷家客厅夜谈。

如我们一般的印象，钱锺书学识渊博、极为健谈，傅雷两个儿子也爱听。傅雷怕孩子不解，不让他们听。一次大家笑谈时，他一下子拉开孩子房门，看见两人偷听，便大发雷霆，连带把整个气氛搞僵。数年后傅雷到钱锺书家，还说：“啊呀，我真爱听钱伯伯说话呀。”可惜傅雷已经不在，此时回忆又是凄然。这样非常时期的交流，是傅雷与钱锺书友谊非同一般的证明。

由于钱锺书的博学和幽默谈吐，他成了极少可以打趣傅雷的人。当然，这其中也有学业的尊重。钱锺书建议傅雷临什么字帖，傅雷便会听从。钱锺书“忽然发兴用草书抄笔记”，傅雷也“高兴地学起了十七帖来，并用草书抄稿子”。

据杨绛文章介绍，傅雷与钱锺书之间还闹过一次“别扭”。那是在20世纪50年代，北京召开了一次翻译工作会议。未能到会的傅雷提交了一份书面意见。讨论翻译问

题当然需要举例，傅雷在意见中，举出不少他见到翻译文字中的谬误例句。他应该没有想到，这份意见被印发在大会上供人参考。他举出的谬误例句，都是有主人的。公开发表，等于让这些翻译家示众。

据杨绛回忆：这份书面意见触怒了许多人，都大骂傅雷狂傲；有一位老翻译家竟气得大哭。此刻，即使傅雷的友人们也有看法。杨绛后来写文章说：“平心说，把西方文字译成中文，至少也是一项极繁琐的工作，译者尽管认真仔细，也不免挂一漏万；译文中的谬误，好比猫狗身上的跳蚤，很难捉拿净尽。”从实际考虑，傅雷尚能先挑几个自己的错误“作陪”，情形也许会稍好些。见到这样的情况，钱锺书以老友身份，去信责备了傅雷的作为，傅雷“气呼呼地对我们（指钱锺书和杨绛）沉默了一段时间……”

钱锺书在信中如何责备傅雷，现在不得而知。态度应该诚挚、可语气当然是严肃的。这一点，傅雷也应该是理解的，所以，一段时间不搭理钱锺书后，“不久就又恢复书信往来”。（杨绛语）



赵朴初诗贺《新民晚报》复刊

周二中

“文革”结束后，陈沂来上海工作，胡耀邦同志就交代他要办好两件事：《新民晚报》的复刊与“大世界”的恢复。1989年《新民晚报》创刊60周年纪念册中，陈沂同志写了《飞入寻常百姓家》一文谈到了此事。可见，《新民晚报》复刊一事，不仅普通百姓关注，高层也很重视。

《新民晚报》复刊时间是1982年1月1日。赵朴初先生曾在上海工作多年，对这份报纸有着深厚的感情，听到《新民晚报》复刊的事，他很高兴，作诗一首：

变化鲲鹏有道遵，
在明德德在新民。
报章重叠千花散，
阔海无边烂漫春。

落款为：一九八二年元月为新民晚报题。末尾还盖了印章。

诗不难理解，一切的运行都是有规律的，《新民晚报》是老百姓的精神食粮，一定会迎着新时代走向美好的春天。事实正如赵朴初老所预言的那样，现在的《新民晚报》依然是国内晚报中的佼佼者。



启功笑谈“书协主席”

夏明亮

1985年，时年73岁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启功被选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二届主席。他的一些同事、学生和书法界朋友前来祝贺，大家请他谈一谈当选书协主席的感受，他微笑着说：“书协主席这个茅坑可不好蹲，有幸占到了位置，别人还虎视眈眈。风言风语都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在那个位置上大肠干燥，没有东西出来，不但不自己难受，别人也跟着着急。”他的睿智和幽默，把大家都逗笑了。

在担任中国书协主席期间，启功想方设法普及和推广中国书法，组织书法交流和研讨，举办各种层次和方式的书法展览，为中国书法的振兴和健康发展尽心竭力，得到各方面的广泛赞誉。

在1991年召开的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上，79岁的启功准备卸任。大家请他讲几

句话，他说：“书协主席这个帽子我戴了6年，天气冷的时候还好，可是现在气候变暖，我的汗水可能把这个帽子弄湿了，现在终于可以不再戴了，我建议拿出来晒一晒，防止发霉。”一席话引得大家忍俊不禁。

其中一位在场的记者问：“启功先生，您认为谁做这个接班人最合适呢？”面对这个难以回答的棘手问题，启功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这位记者：“请问，你到茅坑，干什么去？”记者满脸狐疑地说：“当然是去解决问题呀！”启功接着问：“解决完问题呢？”记者说：“起来走人。”启功点了点头说：“就是嘛，这就对了！问题解决了，谁还会等在茅坑旁边，看看下一个是谁，是不是适合这个茅坑？”

启功的睿智和幽默再一次把大家逗笑了。



朴素憨直的赵树理

崔鹤同

赵树理一年四季总是一身蓝布粗布衫，一件水獭领子，礼服呢面的狐皮大衣，算是他最豪华的“行头”，这也是他冬天御寒的唯一选择。

1950年在北京创刊了大众通俗文艺刊物《说说唱唱》，赵树理是副主编，实质上他干的是主编的活。他每期都亲自看稿、改稿。常常到了应该发稿的日期，还没有合格的稿子，他把经过初、二审的稿子抱到屋里去，一篇一篇地看。差一点的，就丢在一边，弄得满室狼藉。忽然发现一篇好稿，就欣喜若狂，即交编辑部刊发。他把这种编辑方法叫作“绝处逢生法”。有时实在没有较好的稿子，就由编委们自己动手写一篇。有一期，没有像样的稿子，大概是康濯同志说：“老赵，你自己搞一篇！”于是赵树理关在屋里“闭门造车”。他的《登记》（即《罗汉钱》）就是在这种“等米下锅”的情况下写出来

的。孰知，这篇“救急”稿与《小二黑结婚》成了珠联璧合的姊妹篇。赵树理生活简朴，吃饭很随意。肚子饿了，随便看到路边的一小个饭摊，要碗面或两个馍，坐下就吃。后来胡乔木同志跟他说他“你这么乱吃，不安全，也不卫生。”他才有这点选择。

赵树理为人耿直，敢于直言。有一个时期，很多作品对农村情况多粉饰夸张。他回乡住了一阵，回来作报告，说农村情况不像许多作品那样好，农民还很苦，城乡差别还很大。还说，我这块表，在农村可以买五头毛驴，这是块“五驴表！”他因此受到批评。

北京市文联有一个干部不检点，私生活很混乱。后来，赵树理调回山西离开北京，大家送他出门，他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那个人也来了，赵树理喊着那人的名字，说：“我可不跟你在一起了！”赵树理的朴素憨直可见一斑。

悬挂马恩列斯肖像的弄口国民学校

俞长寿

新中国成立前，敢在学校里悬挂马恩列斯肖像的学校还真没听说过，因为在战场上已节节败退的国民政府对社会进步思潮打压得很厉害，一旦发现进步活动恐怕连军统特务都会上门抓捕，那么进步人士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

去年，有一次与蔡文祥先生聊起新中国成立前后笕桥的一些社会情况时，他讲到了弄口国民学校（前身为市立第八民众学校）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

年已86岁高龄的蔡文祥记忆力很好，也很健谈，说起在弄口国民学校读书时的所见所闻如同回到了那个年代。

根据蔡文祥的回忆，他9岁到白石王家井胡家庵上私塾，10岁时转读弄口国民学校。弄口国民学校是一所六年制小学，每个班级约有三四十人，全校共约七八十人，是不同年龄的孩子合在一起学习的混合班。由于蔡文祥上过一年私塾，已有一定的文化基础，所以直

接就读二年级。

蔡文祥介绍说，当年弄口国民学校在笕桥村弄老街花园台门内。这里是清代曹氏树木场旧址，因树木场有花园而得名。花园台门里面有五间平房，弄口小学就在这五间房子里。学校设有一个学生操场。他入学时的学年开学典礼在学校礼堂举行，礼堂正中挂了孙中山肖像，两侧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肖像，墙上还贴着忠孝仁义礼义廉耻等文字。当时学校教学严谨，每周一上课前，都有训导主任引领学生诵读孙中山遗嘱和《十二守则》。他上三年级时，班主任蔡懿老师开始教学生学唱进步歌曲《鬼怪歌》。学会后，蔡懿老师就经常叫学生们唱这首歌。为防止被外人所听见，每次歌唱，老师都叫学生压低嗓音。岁月如梭，如今时间已过去70余年，《鬼怪歌》的整首歌词，蔡文祥已记不清了，

但前几句还能记得：“今年鬼怪多，往年鬼怪少。板凳爬上了墙，灯草打破了锅……”蔡文祥说：《鬼怪歌》可能是老师自己根据《古怪歌》填词的。不过，《鬼怪歌》只唱了两年多时间，在他上五年级时，班主任蔡懿老师突然离开了学校，从此也再未见到过，这首进步童歌也就没人领唱了。

蔡文祥对学校当时的情况记忆清晰，感触颇深：由于弄口国民学校大门出口路朝北，沿街都是民房，人们要经过一个高墙台门才能看到小学的房子，环境比较偏僻，因而学校的教学情况不大为外界所了解，礼堂悬挂马恩列斯肖像和他们歌唱进步歌曲并未受到什么干扰。1948年底，弄口国民学校迁至花园兜跨塘庙，马恩列斯画像依然挂在学校的—个房间里，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还挂着。

蔡文祥那时年纪还小，不懂得什么，长大以后，总觉得当年弄口国民学校应当

是由地下党或进步人士在掌控，不然不会一直在学校悬挂马恩列斯画像，或许学校本来就是地下党的一个秘密交通站。“那时我曾多次见到一些西装革履的年轻人来枸桔弄活动，有时他们会走进我们学校去。还有一些在枸桔弄挑担卖麻油的行贩，新中国成立后一夜消失，后来听说这些挑担卖麻油的人，多数是地下党。”

著名史学家毛昭晰先生在《古韵弄口》序文中写道，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6年至1948年，他作为浙江大学进步学生，曾多次到艮山门外枸桔弄开展进步宣传，有时夜宿就住在花园台门。蔡文祥当年所看到的那些“西装革履的年轻人”是否就是毛昭晰这样的进步青年学生，这有待更多的求证。

蔡文祥当年保送入读浙江医学院（今浙江大学医学院）后，曾师从著名毒理学家黄莘野教授，毕业后分配到温州卫校任教。1978年调入温州市卫生干部进修学校，历任教务主任、副校长、校长，为温州市第六届政协委员。他感慨地说：“弄口国民学校是杭州解放前少有敢于悬挂马恩列斯画像的学校，是杭州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所红色基因小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弄口国民学校更名弄口小学，20世纪80年代初并入杭州笕桥小学。（作者系杭州市历史学会常务理事）